

傅斯年文集

第一卷

傅斯年文集

第一卷

欧阳哲生
编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傅斯年文集/欧阳哲生编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7.10
ISBN 978-7-101-11973-2

I. 傅… II. 欧… III. 傅斯年(1896-1950)-全集 IV.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57089 号

书 名 傅斯年文集(全七卷)
编 者 欧阳哲生
责任编辑 俞国林 刘 明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2017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920×1250 毫米 1/32
印张 124 1/4 插页 28 字数 3000 千字
印 数 1-2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11973-2
定 价 680.00 元



傅斯年留欧时期留影。



建于清代的傅氏宗祠，位于山东聊城东关街路北处。



傅氏一家的祖茔牌坊。



傅斯年的祖辈们在山东聊城北门内相府街傅氏祖宅院内合影。



傅斯年的母亲李氏。



傅斯年进入北大预科时与其弟傅斯岩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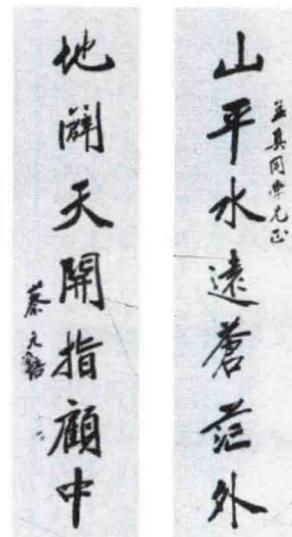
1916—1919年，傅斯年在北京大学学习成绩表。



1919年5月4日，北京大学示威游行队伍向天安门进发，傅斯年为总指挥。手举大旗者为傅斯年。



傅斯年留欧时期留影。



蔡元培先生送给傅斯年的一幅对联，对傅斯年寄托无限的希望。



1921年傅斯年在伦敦时留影。

增订版序言

2003年9月《傅斯年全集》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此书不过几年就销售一空。以后，不断有读者和同行呼请再版，我自感如要再版，则须修订。但因自己为其他研究工作所困，实在无暇、无力进行这项工作，故一直拖延。2013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我编辑的《胡适文集》修订版，随后我下决心将修订和增补《傅斯年全集》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，遂与中华书局俞国林君商量，他欣然同意合作。2014年我们便正式启动了这项《傅斯年文集》增订版的工作。

此次增订版，一方面订正原湖南教育版《傅斯年全集》中误植的文字，一方面增补新发现的傅斯年文章、书信。第一卷新增《文科国文门研究所报告》、《安福部要破坏大学了》、《美公使与学生代表之谈话》、《济南一瞥记》、《留学问题谈》、《国内与国外求学问题》（傅斯年先生致蔡子民先生书、吴稚晖先生致蔡子民先生函）和附录《〈新潮〉杂志社启事》和《国故与科学的精神》（毛子水）。第三卷新增《中国民族革命史》、《再释函父》、《诸葛亮的青年时期》、《〈广西石刻展览特刊〉序引》、《宋本〈文苑英华〉题记》、《关于〈清史稿〉事敬述所见》和附录《论文化事业之争执》（柳诒徵）。

第四卷(本次整理与原湖南教育版第六卷做了调换)新增附录《国立中央研究院 1941 年度工作报告》(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部分)、《国立中央研究院 1943 年度工作报告》(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部分)、《国立中央研究院 1944 年度工作报告》(“历史语言研究所”部分)。第五卷新增《中国古代文学史试题》、《中国三百年来对外来文化之反应》、《文明的估价》、《现代文化与现代精神》、《蔡先生人格之一面》。第六卷新增《二十年武力厉行对日经济封锁政策》、《满洲傀儡剧主人公溥仪》、《四川与中国》、《日本的军事冒险》、《“五四”偶谈》、《欧美形势与中国》。第七卷新增信函约一百通,函目不赘。原湖南教育版《傅斯年全集》序言,仍收录在后,未作改动。

此次增订版没有沿用原《傅斯年全集》之名,而是采用了更为符合内容实际的书名——《傅斯年文集》。在这次增订、编辑、出版过程中,责任编辑俞国林、刘明认真编校了整个文稿,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曹琪、陈少卿、薛玉、赖志伟、刘会文参与了部分文稿的校对工作,对于他们的积极协作和仔细核校,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!

今年是胡适发动“文学革命”一百周年,傅斯年的《文学革新申义》一文可以说是《新青年》刊出的北大在校学生第一篇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文章。新出增订版《傅斯年文集》,是我们献给新文化运动及其先驱者们的一个礼物。

欧阳哲生

2017 年 2 月 20 日夜于京西水清木华园

序 言

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，傅斯年是一个极具个性，而又充满矛盾的奇特结合体。他长期在北大学习、工作，对北大师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，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。他又承接传统的正统观念，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，因此在1949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代，与胡适、钱穆一起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政府“只能控制”的几个代表^①。他力主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，反对所谓“国粹”，反对读经，主张废除“国医”，成为“五四”以后在文化领域最激进的现代化路线的推动者。他又最具民族主义思想，坚定抵御日寇侵略，毫不含糊地抗议苏俄沙文主义政策，维护国家利益，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有力的代表之一。他是纯然学术的真正维护者，一生致力于发展科学的历史学、语言学、考古学，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。他亦政亦学，不畏权门豪族，言谈举止中充满“知识的傲慢”，有一股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精神气概，时人有“傅大炮”之誉。他事必躬亲，治事威严，为人行政有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彻底性精神，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

^① 毛泽东：《丢掉幻想，准备斗争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68年出版，第1374页。

典范。他又致力于铲除社会不平等，体恤下层百姓的民情，为此谋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。这些看似矛盾、趋于两极的选择奇妙地集于傅斯年一身，酝酿一种极致化的表现，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。“纵横天岸马，俊逸人中龙。”这是他的才气和风格的一幅贴切肖像。

傅斯年只活了 55 岁(1896—1950 年)。比起他的三位北大师友刘半农(1891—1934 年)、丁文江(1887—1936 年)、钱玄同(1887—1939 年)来说，岁数要长；而与后逝的胡适(1891—1962 年)、陈寅恪(1890—1969 年)、李济(1896—1979 年)、顾颉刚(1893—1980 年)、赵元任(1892—1982 年)诸友来说，他又走得过早。他曾是这一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。他跌宕多姿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：(一) 学术准备期(1896—1926 年)，从他入小学，上中学，进大学预科、本科，直到赴欧留学，这是他的学生时代。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开始崭露头角，在留学时代他形成了自己治史的学术志趣。(二) 学术成熟期(1927—1937 年)，这一阶段他先后在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任教，并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。他自称：“吾这职业，非官非学，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间。”^①说明了他奔波于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匆忙。(三) 行政工作期(1937—1950 年)，这一阶段他除继续担任“中研院”史语所所长一职外，另还担任过“中研院”总干事、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、西南联大校务委员、北大代理校长，台大校长等教育、学术行政职务，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、立法委员等政职，他的重心明显转向以学术、教育的行政工

^① 傅斯年：《性命古训辨证》序。

作为主，甚至卷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动^①。早在“五四”时期，蔡元培先生即题赠“山平水远苍茫外，地辟天开指顾中”^②，寄望于他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。傅斯年留学归国后，他的留德同学陈寅恪亦赋诗“今生事业余田舍，天下英雄独使君”^③，鼓励他主持复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业。为不辜负师友的期盼，他一生奔走劳碌，因此而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才般的能量。

傅斯年的一生刚好跨越了 20 世纪上半段，这正是中国一个极其混乱而又充满变革性的年代。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这句俗语，远不足以我们形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变数之速，由此而导致评判傅斯年的两极对立，甚至多极差异，也不足为怪。时人以“誉满天下，谤满天下”来说明对傅斯年所牵涉的是非关系和人事纠纷难以评判。但我们不能忘记，作为学术界、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，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、学习、工作过的地方，刻下了深深的痕迹，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。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，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派的代表之一，傅斯年那狂狷独立的行世风格、尽忠报国的民族情怀，已深深地熔铸于北大人的历史传统之中。“中研院”曾是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，作为“中研院”第一大所——史语所的创建者和初期领导者，傅斯年那威仪严苛的“老虎”作风、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，已

-
- ① 关于傅斯年的一生，胡适将傅斯年思想分为“学生时代的思想”“壮年时代的思想”和“晚年的思想”，但胡适未段分壮年和晚年之间的具体时间，参见胡适：《傅孟真先生的思想》，原载 1952 年 12 月 21 日《台湾新生报》。
 - ② 此题词收入王汎森、杜正胜：《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》，台北：“中研院”史语所，1995 年 12 月 16 日出版，第 31 页。
 - ③ 《寄傅斯年》，《陈寅恪集·诗集》，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1 年 5 月版，第 18 页。

成为史语所学派的一种象征。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情形，一种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誉，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发挥影响，但其事功和业绩可能是平平而已，这种人死后的影响力自然是迅速萎缩；还有一种人是生前并未享高位，也不拥有重权，但以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，在生前死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傅斯年属于后者，胡适说：“他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总是一个力量。”“他这样的人，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。他有学问，有办事能力，有人格，有思想，有胆量；敢说话，敢说老实话，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。”^①在一个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历史时期，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，何况傅斯年一生有接连不断的大手笔表现。当我们仔细探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艰难行进的线索时，就不难发现傅斯年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凡表现。

“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。他的记忆力最强，理解力也最强。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，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。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，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、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。他的情感最有热力，往往带有爆炸性的；同时他又是最温柔、最富于理智、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。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，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。”^②这是50年前胡适对傅斯年的一段评语。作为乃师兼友的胡适生性并不好走极端，知人论世，在此一口气用了十四个“最”字来表彰傅斯年，足见其对傅的人格

^① 胡适：《傅孟真先生的思想》，原载1952年12月21日《台湾新生报》。收入《胡适作品集》25，台北：远流出版公司，1986年3月出版，第54页。

^② 胡适：《傅孟真先生遗著》序，收入《傅孟真先生集》第一册，台北：台湾大学，1952年12月出版。

和才性的推许^①。在傅斯年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,海内外有关傅斯年的追思、纪念性的文字持续不断,但这些追忆不约而同地都是为胡适的这段评语补充注脚^②。

研究和评判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传统项目。但这一项目并不因为历史悠久而为我们能驾轻就熟地掌握。恰恰相反,由于历史长河的延伸,累积于历史人物的人为因素越来越多,使得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判越来越容易依赖于主观的能动性。一般来说,时间的间隔对历史的认识更具科学的价值。这是因为时间的距离感可以产生两个效果:一是可以排除当事人的各种是非关系,不因个人的恩怨而产生对认识对象的随意褒贬;二是随着历史的延伸,人们所依存的社会环境超越了历史的存在,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天然地站在更高的起点上。然这两种可能的实现也有一个必需的前提,这就是对历史资料的充分掌握。没有历史资料,历史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。缺乏历史资料,将导致我们对历史认识产生许多盲点。今天我们来讨

① 胡适一生写过的纪念性文字中,对三人的情感表达最为强烈:徐志摩、丁文江、傅斯年,这三人可谓胡适的至友。

② 有关纪念傅斯年结集的文字有:《傅所长纪念特刊》,台北:“中研院”史语所,1951年3月出版。《傅故校长哀挽录》,台北:台湾大学,1951年出版。蔡尚东编选:《长眠傅园下的巨汉》,台北:故乡文化出版事业经纪公司,1979年3月29日出版。《傅孟真先生传记资料》(3册),台北:天一出版社影印出版。《傅斯年》,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1991年8月出版。《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》,台北:“中国上古秦汉学会”,1995年12月出版。《台大历史学报》第20期《傅故校长孟真先生百龄纪念论文集》,台北:台湾大学历史系,1996年11月。王为松编:《傅斯年印象》,上海:学林出版社,1997年12月出版。王富仁、石兴泽编:《名人笔下的傅斯年、傅斯年笔下的名人》,上海:东方出版中心,1997年7月出版。

论傅斯年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，应已具备了许多前人不曾具备的学术的、社会的、史料的诸种条件，因此，我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超越前人的认识水平，以我们现今所具有的历史涵养和认识能力，对其做出合乎时代高度的判断。

一、早期的学术准备

傅斯年的学生时代经历了三个阶段^①：第一个阶段为学前、小学、中学阶段（1913年夏以前），此段现存资料甚少^②。第二个阶段为北大预科、本科阶段（1913年夏—1919年夏），此段可资研究的材料甚多，除北大保留的教务档案可备查外，还有他的同学罗家伦、顾颉刚、毛子水、俞平伯等人的回忆和日记^③，以及傅斯年本人在《新青年》《新潮》发表的大量作品。第三个阶段为在英国、德国

① 有关傅斯年学生时代的分期，何兹全先生亦分三段，即1901—1908年，在家乡读私塾和小学；1909—1919年，在天津读中学，在北大读预科、本科；1920—1926年，在英、德留学。参见何兹全：《民族与古代中国史》前言，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8月出版，第21—22页。

② 有关傅斯年的这一段学生生活，参见英千里：《回忆幼年时代的傅校长》，原载1951年1月8日《台大校刊》第一〇一期。

③ 有关傅斯年在北大学生生活的回忆，参见罗家伦：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，原载1950年12月31日台北“《中央日报》”。伍叔傥：《忆孟真》，收入《傅故校长哀挽录》，台北：台湾大学，1951年6月15日出版，第62—63页。毛子水：《我与孟真的交往》，原载1976年1月台北《传记文学》第二十八卷第一期。俞平伯：《别后日记》，收入《俞平伯全集》第十卷，石家庄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，1997年11月出版，第147—152页。1919年顾颉刚留有未刊的日记，参见顾潮编著：《顾颉刚年谱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3年3月出版，第53页。

留学阶段(1920—1926年)^①。其中在北大这一段,他获得了优质的人文教育,投入新文化的激流,成为时代浪潮中的一个风云人物;在留学时期,他广泛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,开始酝酿自己的学术思想。

1913年夏,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当时的北京大学预科分二类(1915年9月以后改为二部)^②,一类偏重文史,二类偏重于自然科学。傅斯年选择了一类,因他英文程度较好,被编在一类英文甲班。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,京师大学堂是从同文馆发展而来。由于这一历史关系,北京大学预科的课程安排,外语学习的分量所占比重很大,必修两门外语课程。傅斯年天资聪颖,又勤奋好学,三年的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均名列前茅。

1916年秋,傅斯年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。此时政局大变,袁世凯去世,黎元洪上台。黎为制衡北洋系的旧班人马,尽力在反袁或非袁派系中寻找自己的支持者,教育总长人选故有任命范源廉之举。³范在民初与蔡元培有过共事经历,两人关系密切,遂又延请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,这对北大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。另一个影响傅斯年的环境因素是北大国文门的师资力量十分雄厚,担任教员的有:沈兼士、沈尹默、钱玄同、陈汉章、黄侃、刘师培、伦

① 有关傅斯年在欧洲留学生活的回忆,参见罗家伦: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;毛子水:《我与孟真的交往》。俞平伯:《国外日记甲集》1920年1—2月部分,收入《俞平伯全集》第十卷,石家庄:1997年11月出版,第153—163页。另有关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的学业档案,参见刘桂生:《陈寅恪傅斯年留德学籍材料之劫余残件》,原载1997年8月《北大史学》第4辑。

② 毛子水先生称,1913年北大预科分甲乙两部的说法,不确。参见傅乐成:《傅斯年先生年谱》1913年条,收入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七册,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1980年9月出版,第260页。

明、刘农伯、吴梅、朱希祖、马叙伦、马裕藻、刘文典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崔适等，可谓极一时之选。傅斯年能够在学业上迅速成长，与新文化运动的风气熏染有关，这批教师的授业之功实在也不可湮没。受到朴学大师章太炎一门的影响，北大国文门的文字学教学分量颇重，三年都安排了这门课程。对此，傅斯年后来评论道：“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，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，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，是觉着有几种事业，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”，“清朝人的第一大发明是文字学，至于中国的言语学，不过有个萌芽，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”^①。这应是他学习这门功课后的经验之谈。

傅斯年初入国文门时，被章门弟子看中，他们抱着“老儒传经”的观念，想他继承仪徵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”^②。这种情形因胡适的到来和新文学运动在校内的影响，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关于这一过程，毛子水有一段记述：

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，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。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，终因资性卓荦，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；到后来提到章氏，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。与其说这是辜负启蒙的恩德，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，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，遂至憎恶也较深。^③

从傅斯年率学生赶走章门弟子朱蓬仙一事已可看出他对旧学

① 傅斯年：《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》，原载1919年4月1日《新潮》第一卷第四号。

② 罗家伦：《元气淋漓的傅孟真》。

③ 毛子水：《傅孟真先生传略》，收入《傅故校长哀挽录》，台北：台湾大学，1951年版，第1页。